

中国现代文学的 历史经验

刘元树 著

“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历史。历史属于过去，历史经验却属于现在，属于未来。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剖析，发掘出今天文学创作、欣赏和研究可以借鉴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并用，尽力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本质，既能够肯定与接受，又能够平等地对话与商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元树，笔名箭鸣，四川大邑人。1931年夏出生于成都，初入重庆大学，195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出版图书九本，其中专著两本。退休后，发表散文、时评三十余篇。

中国现代文学的 历史经验

刘元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

艾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刘元树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064-4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6063号

责任编辑 徐广琴 周墨西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2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页2
版 次 2013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064-4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性突破

——邓小平同志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方面	1
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8
现代化和民族化融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15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	23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	30

李大钊与“五四”文学革命	47
--------------------	----

《尝试集》的思想倾向和历史地位	63
-----------------------	----

熔新思想入旧形式的光辉典范

——鲁迅旧诗分析	73
----------------	----

苦闷的莎菲与莎菲的苦闷

——兼评莎菲形象的“再评价”	82
----------------------	----

从《死水》写作时间看它的思想性	98
-----------------------	----

《赛金花》之我见

——由柯灵、洪道等同志的文章引起的	104
-------------------------	-----

爱国·开放·创新

——郭沫若“五四”时期创作对我们的启示	123
---------------------------	-----

轻轻地唱出的心底的歌

——郭沫若《女神》之前的诗歌 131

《女神》:中国新诗的光辉起点

——为《女神》重新出版而作 136

《女神》的独特风格 149

《女神》的败笔 156

艺术激情有余,思想深度不足

——论抒情长诗《瓶》 163

诗多好的少

——郭沫若建国后的诗歌 169

郭沫若散文的艺术风格 182

豪华落尽见真淳

——读《沫若自传》札记 190

从心所欲不逾矩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对我们的启示 214

抒情的壮美的战斗的《屈原》 234

《屈原》的艺术构思

——为郭沫若同志逝世周年而作 245

关于《孔雀胆》的主题思想 257

“翻案”何须“傅粉多”

——论《蔡文姬》和《武则天》 269

政治意识·创作个性·艺术规律

——郭沫若创作的经验和教训 280

文学:为了什么?表现什么?

——郭沫若文艺思想发展中的得失谈片 303

像“史”的史

——评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321

郭沫若史剧研究的丰硕成果

——评田本相、杨景辉《郭沫若史剧论》…………… 327

把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放在首位

——我是怎样改革“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 335

写在后面…………… 343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

艾芜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性突破

——邓小平同志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方面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兴衰成败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曾有过如下论述: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①

这应该怎样评价呢?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③这是评价一切社会问题的准则,也是评价毛泽东同志这一论述的准则。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位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家,论述文艺与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 年版。

②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③ 《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 4 卷,同上。

政治的关系(包括《讲话》中的其他论述)自然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第一,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坚持属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当局执行妥协投降路线,使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的边缘。如果文艺对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必然会因失掉读者而丧失自身的前途。第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和广大群众的隔膜就是主要的问题所在。这说明文艺究竟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如果文艺不彻底地解决这个方向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如何为”的问题,新文艺就不可能顺利发展。第三,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国统区奔赴延安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他们一方面脱离现实,脱离群众,一味学习外国古典名著,关门提高;一方面把革命理想化,遇到阴暗面,不是消沉就是用偏激的方式去揭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成为革命文艺的当务之急。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促进了革命文艺发展。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都有过充分的论述,无需再为费辞。

然而,说“文艺”从属于政治,说“一切”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现在看来也有不够准确和严密之处。因为文艺和政治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艺却属于更高的精神层面、文化领域的东西,它与政治的影响是相互的,虽然它受政治的影响或许大于它对政治的影响,但毕竟不是“从属”的关系。否则,文艺就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了。再说,任何事物都有中间状态,并非非左即右,非此即彼。比如三十年代中国那样的“现在世界上”,左翼作家和“民族主义文艺家”的作品自然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而像新感觉派的小说、现代派的诗歌,以及一些表现自然风光、生活情趣、人生经验的作品,就很难

令人信服地回答出从属于什么样的政治路线。

总之,毛泽东同志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历史范围之内”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理论上的局限性。马克思说:“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诗人了。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①马克思强调文艺有它自身的目的,不要把它看成其他事物(比如政治)的从属品,不丧失独立品格的文艺作品才可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如果说,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文艺从属于政治”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在促使创作动员民众、打击敌人上起过积极的作用,那么到了和平建设的社会主义时期,其局限性就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层出不穷,阶级斗争时刻要讲,“左”倾思潮愈演愈烈,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在“左”倾思潮的干扰下,文艺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政策的图解,政治口号的演绎,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求文艺“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画中心”成为时代的风尚。这种小生产者狭隘的文学观念(姑且不说为冒牌政治服务的阴谋文艺的主张者们),打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号压人,一时甚嚣尘上,为害至深。

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作的报告《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在论述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文艺可以在这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时,明确表示:

^①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中，对文艺与政治的这一论述是历史性的突破和超越。这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冲破两个“凡是”^①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思考的创举。他把文艺看做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把文艺提到关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党的利益的高度。这就在剔除“从属”论的偏颇的同时，防止了“脱离”论的谬误，闪烁出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这一论述深刻地总结了几十年来党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高度地概括了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照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路明灯。谁离开了它，就会不是犯“左”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历史事实可以为邓小平上述论断的正确性作证。鲁迅的《呐喊》之所以具有那么强大的冲击力，主要就在于它是战斗的“呐喊”，给寂寞中的战士“助助威”^②；郭沫若的《女神》之所以具有那么强大的鼓动力，主要就在于诗人立志用诗歌“改革社会”、“唤醒睡狮”^③；三十年代的抗日歌曲，比如《黄河大

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② 《〈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郭沫若选集〉自序》、《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郭沫若谈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之所以如此地动人心弦，感人肺腑，主要就在于它们捕捉到了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并给予明确而响亮的回答。这些都不仅说明文艺不可以脱离政治，而且进一步说明政治对文艺的助益。

然而，文艺又不是从属于政治的。郭沫若建国以来的许多诗歌，特别是那本《百花齐放》，被当作政治的从属物，生硬塞进那个特定年代的政治口号如“反保守”、“促进派”、“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农业纲要四十条”之类，导致作品的彻底失败。新文学中被历史淘汰的作品里，为一时一地的中心政治任务服务的宣传品实在不少。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属论”对我们文艺的发展实在是“利少害多”。

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邓小平同志发现了一个对我们观察社会、认识问题极为重要的规律，即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①。因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容易吓唬人，也容易迷惑人。

从1978年开始，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党中央把工作的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以此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同时，知识分子也从“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姑且不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臭老九”的批判对象），变成应该依靠和必须依靠的对象——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认为，他提出的文艺不可以脱离政治、又不是从属于政治的论断，便是既反“左”又反右的思想、也是党中央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在文艺思想上的表现。于此可以明显看出，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

^①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又强调文艺不可以脱离政治,从前者演绎出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被“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所取代,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实在容易导致人们对文艺功能的简单理解,这种简单理解容易被反过来又容易增强其狭隘性的弊端。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前行,文艺的路子就可以越走越宽广。因为人民的喜爱和需要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只要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文艺就应该提倡,无害的也允许在文艺园地里给予一席之地。邓小平同志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说:

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①

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而又强调文艺不可以脱离政治,与前者相应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自然也被废止,代之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自然也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②。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本来就不能简单地视作政治和艺术的混合物,而且“革命之所以……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③，“政治标准第一”，势必会降低对艺术标准的要求。何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同上。

③ 《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政治仅仅是思想的一个侧面,涵盖不了文艺作品可能包含的全部思想,有些作品还可能根本不存在政治因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今天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因此,用对实现四化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评价文艺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既给文艺工作者以广阔思考的天地,又牢牢把握住政治的大方向,提醒文艺工作者注意不要越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

列宁早就指出,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①。邓小平同志总揽全局,高瞻远瞩,对文艺与政治关系论述的历史性突破,把文艺从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解放出来。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文艺必将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出现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新景象。

(原载《江淮论坛》1997年第2期)

^①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中国文学发展到“五四”时期,产生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由旧文学飞跃到新文学,由近代文学飞跃到现代文学。这个飞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从戊戌变法以来二十多年的准备,到了“五四”时期方始水到渠成。所以,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就必须对它的准备阶段,特别是晚清文学改革运动,作一个简略的追述。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各帝国主义紧跟着纷纷侵入,封建独立的古老中国遂沦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境地,原先的闭关自守被迫变为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广泛的接触。帝国主义在入侵中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大实力,伴随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在各地兴办的工厂和学校,都在无言地说明着资本主义的强大优越性。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国人不得不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

反思者的立场不同,所持的政治理想不同,得出的结论当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师法资本主义,以求救亡图存。魏源说要“师夷长技以制夷”^①,冯桂芬说“今日又宜曰鉴诸

^① 《〈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